



## 春风白银图书奖(非虚构):《北纬四十度》

## 陈福民:绘制一幅别样的千古江山图

chen fumin



以北纬40度为纬,以历史为经,可以展开一幅怎样的地图?

往西看,安卡拉的石碑上记载着突厥人与蒙古人的中亚霸主之争,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千五百年的风雨中飘摇,马德里街头的《国际歌》余音犹在,忽而又闻马丁·路德·金在华盛顿发出“我有一个梦想”的呐喊。

往东看,中华五千年文明从昆仑山脉蜿蜒盘桓,经万里长城的不断加固,奔涌至四海五湖。力排众议推行“胡服骑射”的赵武灵王,御驾亲征反被困于白登的汉高祖刘邦,英勇无畏却悲剧性自杀的李广,以娇弱身躯扛起野心和欲望的王昭君……

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,故事人物在变,但地点场域却从未变过。

各朝兴亡盛衰在这幅千里江山图中徐徐展开,站在北纬40度地理带上,陈福民眺望着,遥想着。

对这位生于、长于、学于北纬40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、评论家来说,写下《北纬四十度》,比起巧合,更像是天意。

陈福民:生于1957年,学者、评论家,现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,著有文学评论集《阅读与批评的力量》等。

## 生长于北纬四十度

生长于河北承德的陈福民,一直把“老热河”挂在口中。他的父母一直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

老热河人的记忆一直伴随着陈福民的生长与学习,著名的喜峰口战役在这儿被老一辈津津乐道,《大刀进行曲》的歌声从此响彻全国。比起土地肥沃的华北平原和水草丰茂的蒙古草原,夹在中间农牧兼营的热河,贫苦得多,荒凉得多。

在书中,陈福民把热河比做“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”,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。

陈福民的家与承德避暑山庄仅有一墙之隔,幼时的他常常和小伙伴翻墙进去游玩,在这里度过了野蛮生长、自由放肆的日子。于他而言,避暑山庄所代表的,是热河基因里简朴清贫的生活方式,在他身上留下的,则是承德人“大而化之”的性格烙印。

18岁离家远行工作,21岁考上河北师范学院,从承德到北京,再经过京张铁路的31个站点,他来到了张家口宣化区,开启了新的求学之路。

同为北纬40度,同样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的宣化,对陈福民来讲并不难适应。当时学校发粮票,粗粮和细粮按3:1的比例分配,平时吃饭则以高粱米或玉米面为主。

河北保定来的同学吃惯了面粉,面对粗粮连声叫苦,而陈福民则反之,他调侃道:“虽然在承德我还是个城市户口,但我平时也就吃这些。”

虽然一直生长于北纬40度,但年轻时的陈福民并没有将这个特殊的维度和历史串联在一起。他从小喜欢地理,没事就拿着中国各省的地图琢磨:河北承德在长城以北,北纬41至42度之间。

到了中学,他开始反复阅读《史记》,书中有关匈奴、鲜卑的故事让他颇感兴趣,白起、李牧等英雄的故事让他热血沸腾,“恨不能追随麾下”的冲动和求之不可得的遗憾。”

通读再三,他发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、政治事件以及杰出的英雄人物,基本上出现于北方及黄河流域。有时他也会思考:如果大明王朝按和平的方式进入近代,那么在长城以北,拥有同样汉民族文明的承德,其身份又当如何自处?

在北京定居后,他常常沿着G6公路自驾西行,在这条坐落於北纬40度的公路上,他看见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装着满满当当的小汽车,开往包头及更遥远的地方。西北人民对于现代交通工具的需求,让他想起汉武帝时期对于战马的热爱,那实际上正是对于速度的追逐。

他不由发出感慨:“历史不断消失,又不断重生,只是换了新的面貌和方式,重新再上演一遍。”

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在这个地理场域里,陈福民往昔的所得所感所困,逐渐被串联成了《北纬四十度》。

## 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面相

翻开《北纬四十度》,各类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长卷缓缓展开——

推行“胡服骑射”、修筑长城的赵武灵王,为何在壮年宣布退位?

打了败仗选择自杀的李广,为何被匈奴尊称为“汉之飞将军”?

一代名将卫青、霍去病,又为何被打入“佞臣”的另册?

在书中,陈福民引用各类史书上的文字阐述史实,二十四史、断代史、专业史……信手拈来。而这一切,得益于他平时广义的历史积累。

在他看来,阅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,前者将书视作

工具使用手册,对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地阅读;后者则和学科领域相关,是更为广泛的阅读,“在平时看起来或许是无效的(内容),在之后可以相互联系。”

上大学时,他本来报的是历史系,后被调剂到了中文系,但他对历史领域的阅读兴趣从未减弱。陈福民常常跑图书馆找各种类型的书看,从中国史到欧洲通史,再到世界史,这些积累让他在后续的写作中得心应手。后来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:“如果你要做学问,无用之书要多读一些。”

但与传统历史研究不同,在落笔成书之前,他试图通过观察和感悟,用生动的语言与细腻的笔法,重述一个个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中形成的历史人物。

在书里,被历史忽视的英雄被重新提起。

对赵武灵王,陈福民称赞他是具有雄才大略,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的一代雄主,借梁启超的话来讲,“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。”他用半页的篇幅展开猜想:假若赵武灵王没有在“沙丘之变”死于非命,如果他直捣咸阳纵横千里……事后回想,就像陈福民所说:“如果成功和失败在同一辩证关系上,在无尽的时间中谁又敢说自己是真正的胜利者呢?”

在个人好恶明晰、迷恋“忠奸模式”的历史记录中,陈福民拨开迷雾,结合复杂的史实,借当代的文学眼光重新回溯历史。那些经过书写和传播后被遮蔽的历史面相被一一打开,这也是他想做的:在不同民族相互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,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。

## 以史实为底的非虚构写作

历史研究和文学,有很大的差别,前者奉行的是真实性,通过学术条件和行为逻辑推导出所谓物理意义上的真实,但后者奉行的是虚构性,通过合理的想象,叙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。

除了表达自己理解和思考的历史外,通过这次写作,陈福民还想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”。这是他的一个私心,他笑言:“我用一种煽情的方式告诉历史学的朋友,不要看不起文学,说我们只会瞎编。我希望让大家能够信任我的文字。”

在《北纬四十度》的写作中,陈福民首先考虑的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,为此他对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引用。于他而言,“如果这个书在历史材料上站不住脚,就没有意义了,那完全成了一种抒情散文。”

写《北纬四十度》时,他给自己设定了双重难度,一方面是要保证历史的真实性不出问题,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如何将其写得好看好玩,增添其文学性。

他心里很明确,《北纬四十度》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著作的缩减版或普及版,而是建立在当代文学表达水平上的历史非虚构写作。在真实和虚构的边界中,逐渐模糊而诞生的非虚构,既站在了事实的肩膀上,又插上了文学的翅膀。

“比如,在《那么,让我们去洛阳吧》这一章里,孝文帝的南伐和迁都是历史真实,但是临走时他是否曾站在帝国宫殿上,望着北方的地平线浮想联翩,没有人知道。这种细节性的文学手法,对整个故事的逻辑、历史的真实性,是没有伤害的。”

在他看来,胡适所提出的“多研究问题”是非虚构写作最有价值的面向。通过《北纬四十度》他将问题聚焦于民族史和文明史之间,当读者设身处地站在同等历史条件的立场上,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、文明都有发展的权利,而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发生的冲突,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中国历史进化的动力性结构。

谈及遗憾,他坦陈书上交汇文明的程度之复杂,远不止十几个章节、人物表达的这么简单,在人物故事上他也有未补足之憾,“难度比较大,有点不太敢碰了。如果有机会写下一部的话,我可能尝试新的题材。”



中国作协